

基于异质性企业能力的经济复苏解释与路径抉择*

庞晓波^{1,2} 黄卫挺¹ 贺光宇¹

(1.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2. 吉林大学商学院)

摘要: 经济复苏存在四种潜在路径, 历史上,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复苏路径呈现出差异性。通过构建一个基于异质性企业能力的简单模型可以对这种路径差异进行解释, 从而成功打开“衰退-复苏”的过程黑箱。对企业能力的动态演进进行分解, 可以得到企业能力演进(技术演进)的达尔文竞争效应与制度变迁效应, 两者成为经济复苏的政策落脚点。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化事实, 重点讨论了增长导向型达尔文竞争效应与制度变迁效应背后的政策因素, 并对中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采取的战略措施进行了简要评述。

关键词: 经济复苏 异质性企业能力 技术进步

引言

危机过后, 经济复苏总是最令人期待的。人类历史上, 由战争、自然灾害以及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复苏”过程不断上演,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最为深刻的现实案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配合与政策联动下, 本次金融危机的短期破坏效应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遏制; 但是, 基于路径依赖与各种滞后效应, 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 经济复苏仍然是个漫长的过程。历史数据表明, 经济复苏少则需要三到五年, 多则长达十到二十年, 并且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过程具有差异性。遗憾的是, 在“衰退—复苏”研究范畴内, 学术界更多的是关注如何“止跌”, 对经济复苏过程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相对较少。以国内学者为例,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至今, 关注未来经济复苏的文献寥寥可数。陈元(2009)讨论了后经济危机阶段的强制性经济发展路径变迁, 他的研究重点是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在本次危机中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 并结合中国的现实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洪银兴则从更加务实的角度给出了中国经济复苏战略中的政策建议, 认为后危机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要靠创新型经济推动^①。毫无疑问, 这些研究对推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但从严谨性来看, 目前仍然缺乏一个能够系统性解释和支持这些政策建议的理论框架。

危机背景下, 经济复苏是经济发展长远战略的阶段性目标, 经济复苏战略应该置于长远发展战略的框架之内进行政策设计。从中期(经济周期)角度来看, 上行与下行是经济运行的两个基本态势, 经济管理的目标是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经济的持续上行, 力避经济下行, 进而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不变。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 刘树成等(2005)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可在保持长期增长前提下, 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我们注意到, 虽然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态势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从中期来看, 本次金融危机已经使得“经济在高位势上实现波动平滑”的条件发生改变, 结合当前的中国经济运行态势, 宏观政策的中期目标定位已经转向寻求可持续的强势复苏, 即抓住危机带来的战略机遇、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支撑点, 并在制度层面上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因此,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经济复苏的理论构建实质上就是中期发展战略的理论构建。

本文意在理论方面对经济复苏问题进行尝试性讨论。具体来说, 本文将围绕经济复苏路径, 构建一个基于异质性企业能力的理论解释框架并给出指导性的政策操作建议。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将从经济史的角度对经济复苏的可能路径进行讨论, 并对其背后的冲击效应进行分解; 第三部分将对这些异质性复苏路径进行解释, 其切入点是异质性企业能力, 本部分还将对异质性企业能力的来源进行阐述; 第四部分从理论过渡到政策, 对政策操作与分析框架进行了深入说明; 最后部分讨论了中国的经济复苏政策并总结全文。

* 本研究获 985 工程吉林大学“经济分析与预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编号 985CXJD006)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 06JJD790012)资助。最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观点, 特此声明。

1 经济复苏的潜在路径

没有经济衰退，就无所谓经济复苏，因此，有必要先对经济衰退进行简要分析。现实中，除了经济运行的机制缺陷，导致经济衰退的冲击可以归为三类：重大自然灾害（如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政治危机（如世界大战）与金融危机，它们通过影响不同的生产要素来影响产出。在增长模型中，宏观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对任何一种要素的冲击都有可能造成经济的停滞与衰退。比如，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影响劳动力供给，以中世纪的黑死病为例，它大约夺去了欧洲一半的人口；而政治危机中的战争往往对所有生产要素产生毁灭性影响，它不仅造成大量的劳动力死亡，同时也破坏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金融危机的作用机制更为复杂，金融危机往往内生于经济运行本身，特别是在现代信用经济体系下，金融危机已经全方位影响到了经济运行，典型的，金融危机在改变资本积累路径的同时还通过就业渠道影响有效劳动力利用。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抗冲击能力不同，这些冲击带来的现实影响不尽相同，再加上政府应对策略的不同，经济复苏也呈现多种路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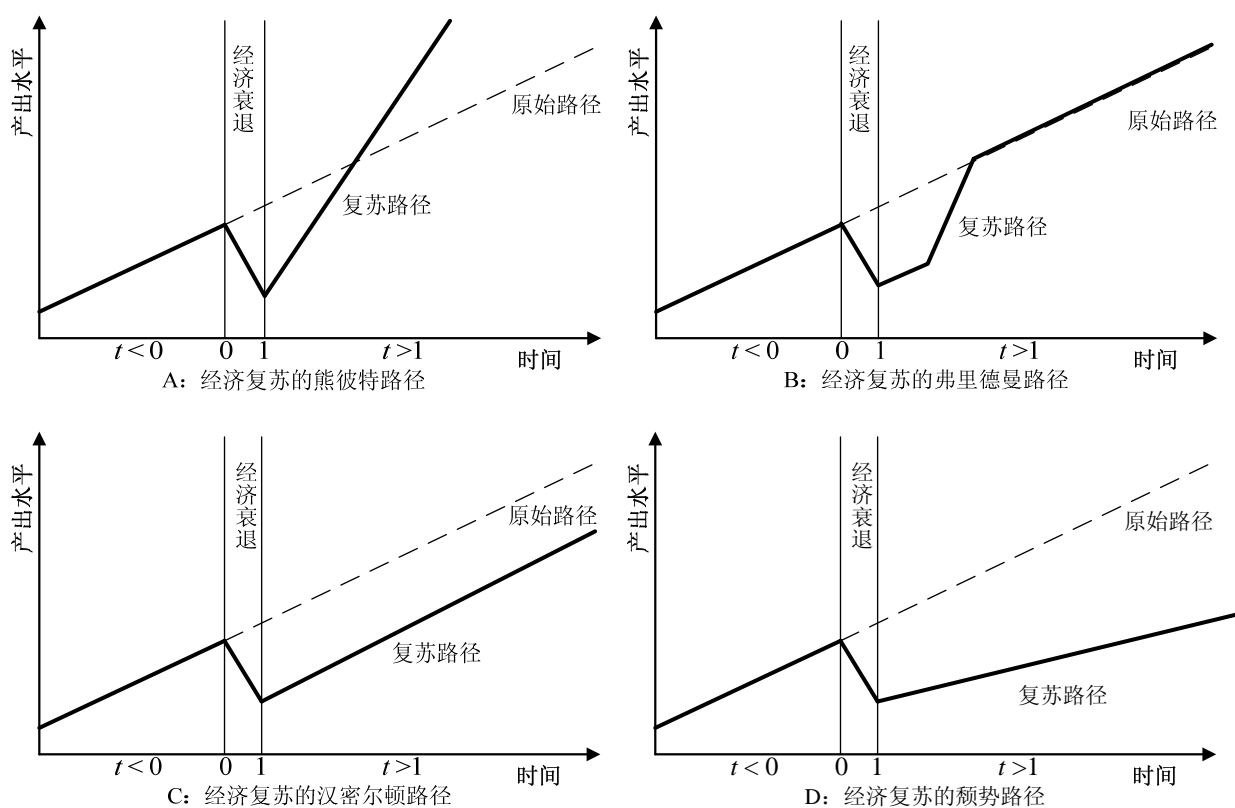


图 1 经济复苏的四种潜在路径

根据 Ben-David 和 Papell (1995)、Crafts (1999)、靳玉英和吴茂松 (2006)、Cerra 和 Saxena (2008) 以及 Gourio (2008) 等人的大量实证研究，经济衰退之后存在四种潜在的复苏路径：熊彼特路径、弗里德曼路径、汉密尔顿路径以及颓势路径，前三种路径以提出者命名^⑥。首先，熊彼特复苏的路径形态（图 1A）是在经济衰退之后，产出水平呈现出强势上扬势头，经济增长率高于衰退之前的水平。大萧条之后的澳大利亚以及二战后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实现了衰退之后的熊彼特复苏。其次，对于弗里德曼路径和汉密尔顿路径，其复苏特征都是衰退前后的产出增长率保持不变，所不同的是，弗里德曼路径下经济恢复到衰退之前的水平（图 1B），而汉密尔顿路径下经济则存在一个永恒的负飘移项，该飘移项构成了冲击带来的永久损失（图 1C）。智利（1928-1941）、尼日利亚（1965-1988）、墨西哥（90 年代初拉美危机）等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经实现了弗里德曼复苏；而瑞典（90 年代初银行业危机）、印度（1977-1978）、英国（80 年代末）则是典型的汉密尔顿复苏。最

后是经济复苏的颓势路径（图 1D），在该路径下，不仅经济增长速度低于衰退之前，而且冲击带来的损失也将越来越大，典型的例子有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泰国、印度尼西亚。

从上述四大复苏路径分野可以看出，衰退带来的长期影响可以分解为两类：创造效应（CE）和破坏效应（DE），这正是“危”与“机”并存的逻辑所在。一般来说，破坏效应不言而喻，但创造效应的解释则需要深入的理论分析，此处，笔者将就两种效应与复苏路径形态的关系进行论述，并在下一部分详细构建和说明两种效应背后的理论逻辑。记冲击发生时刻 $t=0$ ，冲击发生前与整个衰退过程的事件窗口记为 $[T=-1, 1]$ ，其后的复苏时间 $t > 1$ 。这样，三者的关系可以用下式表达：

$$TE = \int_0^t (ce - de)dt = CE - DE \quad (1)$$

上式大写表示累积效应，小写表示边际效应（下同），TE 就是我们在图 1 中观察到的路径形态，比如，在冲击发生之后的衰退期，破坏效应占据主导， $TE_{t=1} < 0$ 。表 1 给出了四种复苏路径中创造效应与破坏效应的边际与累积分解，它们分别对应于复苏路径斜率与复苏路径的漂移项，边际效应分解和累积效应分解的不同组合最终决定了复苏路径的特征。根据这种理论上的效应分解，不少学者已经从实证角度进行了详细研究（如 Caballero 和 Hammour, 2005）；然而，从理论角度对复苏路径形态的形成机理与复苏异质性——冲击效应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行解释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笔者认为，这里的机理挖掘可以建立在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之上，不管是衰退还是复苏，都是经济增长要素或机制变迁引致的宏观结果。

表 1 复苏路径的最终效应分解（ $t \rightarrow \infty$ ）

复苏路径	边际效应			累积效应		组合特征
熊彼特路径	$ce > de$	$te > 0$	增长率变大	$CE > DE$	$TE > 0$	收益增大
弗里德曼路径	$ce = de$	$te = 0$	增长率不变	$CE = DE$	$TE = 0$	近似归零
汉密尔顿路径				$CE < DE$	$TE < 0$	损失固定
颓势路径	$ce < de$	$te < 0$	增长率变小			损失增大

2 复苏路径的异质性企业能力解释

对于经济复苏来说，增长理论是个自然的理论起点。遗憾的是，不管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坚持代表性个体，其代价是忽略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这种微观机制的缺失将导致“衰退-复苏”过程的黑箱化。本质上，经济增长过程就是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同种资源在不同企业之家的配置，二是同一企业对不同资源的组合配置，只有两者的配置效率都达到最优，经济增长才会在帕累托效率路径上运行。然而，在代表性个体的假设下，同类资源的企业间配置问题被掩盖，经济增长所要处理的仅仅是同一企业对不同资源的配比（如资本与劳动配比）。这种研究思路事实上是将整个经济被视为一个大型企业，从而导致企业的微观资源配置行为缺失。因此，经济复苏路径的理论构建必须转向异质性企业假设^③。

2.1 异质性企业能力与产出

异质性企业假设将导向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现实中，企业在资本、劳动力还是技术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根据企业资源基础理论，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不同企业之间的能力异质^④。为了便于分析，假设企业的这种异质性能力 i 近似服从 $[0, \infty]$ 区间内的线性分布，结合内生增长理论与企业能力假说，可以认为技术是企业能力的核心决定因素。令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_i = f(i)$ ， $f' > 0$ ， $f'' < 0$ ，这样，产出仅仅取决于企业能力，企业能力的边际产出是递增的。因此，经济中的总产出可以表示如下：

$$Y = \int_i^{\bar{i}} (f(i) - C) di \quad (2)$$

式(2)中 \bar{i} 表示市场中在位企业的最高企业能力，它可以由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外生决定，也可以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所假设的内生决定； \underline{i} 是市场竞争所能容许的最低企业能力，企业的能力与竞争优势只有达到这个最低水平才能生存，它由市场竞争内生决定。简单假设所有企业的生产成本都为 C ，则 C 的大小可以近似表示经济运行的景气特征， C 越大意味着经济越不景气。企业的竞争与生存是利润导向的，当企业利润为负时，则意味着企业破产，这样就可以令 $f(i) = C$ ，从而得到企业生存的最低能力 \underline{i} 。

由于 f 服从单调递增特征，“衰退-复苏”过程中的产出分析就可以根据企业能力 i 的上下界变动展开。以冲击发生时点为界（ $t = 0$ ），毫无疑问，在冲击作用的初期（ $t \in [0, 1]$ ），随着经济景气恶化，生产成本 C 变大，这将导致经济中大量的低企业能力破产淘汰，从而提高在位企业的能力分布下限，即 $\underline{i}^1 > \underline{i}^0$ 。有学者通过更为复杂的模型证明了这点，并将这种淘汰（割尾）机制视为冲击到来的“清洁效应”（Caballero 和 Hammour, 1994）。与此同时，基于经济景气的急剧恶化，创新与创业活动在短期内并不能大规模展开，由此可以近似认为 $\bar{i}^1 = \bar{i}^0$ 。这样，根据经济中企业能力 i 的上下界变化特征，对总产出函数进行积分就可以得到 $Y^1 < Y^0$ ，这正是冲击带来的经济衰退表现，也是(1)式中 $TE_{t=1} < 0$ 的微观机制所在。在完全市场假设下，当经济经过“清洁”走向复苏，竞争机制将会导致企业能力分布的整体前移。随着经济复苏，清洁效应释放出来的这部分资源与市场空缺存在两种配置渠道：新企业进入与在位企业扩张。出于竞争压力，新企业要想进入并生存下去，其企业能力必须高于或者等同于在位企业，否则在位企业可以通过内部创业、扩大规模抢占复苏的市场；另外，由于存在伯特兰博弈，在位企业之间竞争也将导致企业能力的整体推进。因此，总的来说，在有效的竞争政策框架内，复苏过程的企业能力将得到整体提升，即 \underline{i} 和 \bar{i} 都将随着 $t > 1$ 变大而变大。上述整个过程正是熊彼特（1990）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机制，当然，该机制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竞争制度，下一部分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创造性毁灭带来的创造效应是极具诱惑力的，然而很多实证研究发现，现实经济复苏过程中的熊彼特路径并不比其他三类路径常见，这需要研究破坏效应的理论机制。在异质性企业假设前提下，Barlevy（2002）和欧阳敏（Ouyang, 2009）对上述创造性毁灭过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分别提出了两种破坏效应：玷污效应（Sullyng Effect）和伤疤效应（Scarring Effect）。在创造效应的论述中，企业能力上限值在冲击初期保持不变，即 $\bar{i}^1 = \bar{i}^0$ ，而当经济进入复苏阶段， \underline{i} 和 \bar{i} 都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大；玷污效应与伤疤效应正是针对该结论提出疑义。玷污效应认为，冲击不仅影响到企业能力较差的企业，对于能力居于上游的企业同样存在着制约作用。Barlevy的模型表明，优秀企业的岗位创造、技术研发会受到冲击影响而放缓甚至停滞，采取就业搜寻策略的高技术工人将不得不从事低效率岗位的工作，这直接导致了岗位效率与个人能力的错配，形成危机过程中的就业结构性失衡。就业的这种结构性失衡将导致企业能力分布的上限降低，即 $\bar{i}^1 < \bar{i}^0$ ，由于 $f'' > 0$ ，这种上限的降低将带来更大的产出损失。伤疤效应则分析了处于成长初期的优质企业。欧阳敏认为，优秀的新创企业往往较为脆弱，在成长初期并不会表现出很高的企业能力，但从长期来看，它将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冲击来临之时，这种初期的脆弱性将使得部分优秀新创企业被错误地清洁出去；欧阳敏对此进行了模型较准，她发现伤疤效应的负向影响完全可能挤出清洁效应的正向影响。另外，对比上述玷污效应与伤疤效应，可以发现前者关注的是冲击背景下的企业进入（新岗位创造），而后者关注的是企业退出，当这两种具有互补性的机制共同作用时，将强化冲击带来的毁灭效应。

2.2 企业能力演进的达尔文竞争效应与制度变迁效应

基于企业能力在“衰退-复苏”路径解释中的关键作用，下面将对企业能力的自身演进进行重点分析。上文将企业能力变迁归咎于企业之间的竞争，然而，完全竞争假设在现实中并不成立，产业竞争格局往往受制于政府竞争政策；另外，来自制度分析和管理学研究的研究成果表明，企业能力变迁还取决于制度因素。因此，本部分将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解释企业能力的动态演进。

首先，将技术作为投入要素的代表，记为 T ，制度要素记为 I ， \bar{T} 表示潜在的技术前沿，对于单个企业来说，技术前沿变量与制度要素都是给定的。这样，根据North和Wallis（1994）、Aghion和Howitt（2006）等人的研究，可以将企业能力 i 视为技术的单调函数，该函数受约束于技术前沿与制度要素：

$$i = i(T|\bar{T}, I) \quad (3)$$

对(3)式进行微分可以得到企业能力演进的动态路径，即

$$\hat{i} = di(T|\bar{T}, I) = d(di/dT)/d\bar{T} + d(di/dT)/dI \quad (4)$$

(4)式中的第一项表示的是达尔文竞争带来的企业能力演进（达尔文竞争效应），第二项则表示的是制度变迁带来的企业能力演进（制度变迁效应）。

首先，对于达尔文竞争效应，Boone（2001）、Aghion 等（2005）、Aghion 和 Howitt（2006）等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证据，这些研究认为，在制度要素固定的情况下，技术变迁（企业能力变迁）存在两种形式：技术追赶（catch up）与技术创新：

$$\hat{T} = P(b)(\bar{T} - T) + P(p)T \quad (5)$$

(5)式第一项代表技术追赶型技术变迁，第二项表示创新型技术变迁，两者的权重取决于技术政策变量 $P(b)$ 和 $P(p)$ 。比如，当企业的技术水平 T 远未达到技术前沿水平 \bar{T} ，技术研发策略以模仿为主，此时第一项具有较大的权重，技术变迁的主要形式是技术引进和模仿；而当企业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技术前沿水平 \bar{T} ，企业技术变迁主要来源于自主的技术创新，此时第二项的权重更大，此时，技术变迁的机制类似于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机制（阿吉翁和霍依特，2004）。对于企业来说，到底选择哪种技术研发策略，则取决于竞争环境与竞争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产业壁垒、反垄断法、技术法案等。它们将构成产业竞争的外部构建，影响产业的内部竞争行为，并最终决定达尔文竞争效应（Hunt，2007）。

对于制度变迁效应，North 和 Wallis（1994）构建了一个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整合分析框架。他们认为，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两种成本，转化成本和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的目标导向是最小化两种成本之和。传统的生产函数处理的是要素的转化过程，即关注生产的转化成本，而将制度变迁整合到生产函数中（即将(3)式代入(2)），基于科斯的交易成本分析范式，制度变迁效应可以理解为制度变迁带来的交易成本变化，因此， $dC/dI \neq 0$ 是制度变迁效应的一个重要构成。但是，诺斯等人指出，在交易成本之外，制度变迁还将影响技术变迁，进而影响转换成本， $d(di/dT)/dI \neq 0$ 成为制度变迁效应的第二个重要来源。在 North 和 Wallis(1994)的研究基础之上，Nelson 和 Sampat(2001)进一步论述了技术、制度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拓宽了技术的定义，认为技术包括物理技术与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两类，制度正是社会技术的核心构成。将他们的研究纳入到(3)，则可以构建一个统一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对于企业来说，作为社会技术的制度与物理技术的前沿边界共同构成了企业物理技术变迁的外围环境，并共同决定了诺斯意义上的企业生产转化成本与交易成本。

这样，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企业能力函数(3)及其动态化(4)的具体作用机制；根据达尔文竞争效应与制度变迁效应机制，再将(3)代回(2)式，就构成了一个包括制度分析在内的微观增长模型。这正是解释复苏路径差异化的理论逻辑所在，简单的说，(1)式中两大效应的权衡，即复苏路径形态，最终取决于(4)式中在位者企业能力的动态变迁，如果达尔文竞争效应与制度变迁效应都是正的，则经济复苏将可能最终走向熊彼特路径。

3 政策含义：增长导向的复苏政策设计

从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复苏路径抉择的政策操作最终落脚于企业能力演进的微观机制，即(4)式中的达尔文竞争效应与制度变迁效应，政策操作的核心目标是引导企业能力的有效推进。从(4)式的分析可以看出，达尔文竞争效应与制度变迁效应的方向是未定的，因此，有效的复苏政策必须要保证 $d(di/dT)/d\bar{T} > 0$ 和 $d(di/dT)/dI > 0$ ，称为增长导向型竞争效应和增长导向型制度变迁效应。

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策操作的基点也有所不同。下面，本文将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化事实，重点讨论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复苏过程中的政策操作。

3.1 技术演进策略与竞争政策设计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为技术自发演进提供了理论解释，将竞争作为推动技术进步的引擎这一重要思想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演进来说，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以下

两个典型化事实：(1)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远没有达到世界技术的前沿边界；(2) 作为技术进步引擎的竞争机制受制于政策供给。基于这两个典型化事实，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演进将具有鲜明的阶段性与政策嵌入性特征。

从技术变迁的分解式(5)可以看出，阶段性策略事实上是一种超边际决策行为(杨小凯，2003)。从全球技术分布蓝图来看，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展国家都采取了角点技术策略，即发达国家采用了创新型技术演进策略($P(b)=0$)，发展中国家则采用了追赶型技术演进策略($P(p)=0$)。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角点策略的背后却是昂贵的技术租金与实质上的技术陷阱。在技术专利的国际制度框架内，发展中国家并不能无成本的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而发达国家也会出于国家竞争战略考虑对前沿技术进行封锁。因此，这种角点技术演进模式最终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以高昂的代价将自己固守在教学落后阵营。笔者认为，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化事实，超脱上述技术陷阱必须放弃当前的追赶型角点策略，有步骤的转向中间策略，最终实现创新型角点策略。在(5)式中，这反映为 $P(p)/P(b)$ 的发散演进，由于 $P(p)$ 和 $P(b)$ 是技术研发的政策变量，结合第二个典型化事实，该过程需要有效的竞争政策供给。在经济“衰退-复苏”过程中，由于存在清洁效应、玷污效应以及伤疤效应，最重要的竞争政策供给是建立有效的产业间竞争政策与产业内部竞争政策，它们将共同决定复苏进程中企业能力与技术水平的更迭。

现实中的技术水平不仅表现出产业间差异，同时也表现出产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差异。首先，在衰退期与经济复苏初期，可以借助冲击效应带来的契机实现产业调整。笔者认为，这种产业间的调整并不是对某个产业的简单淘汰，相反，它是一种产业比重调整的结构优化行为，政府所要扶持或培育的是具有技术优势与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当然，上述产业间结构调整具有很大的行政干预色彩，正如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实质是危机背景下的发展路径强制性变迁，是凯恩斯主义式的短期应急之策(杨春学、谢志刚，2009；陈元，2009)。而在危机过后进入实质复苏阶段，笔者认为则需要建立一种规则性的竞争政策，这些竞争政策将主要影响产业内部的竞争行为，其作用是保障达尔文自然选择机制的有效发挥。对于这种保证中长期技术进步的有效竞争政策设计，管理研究与产业组织理论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认为，最重要的竞争政策是保证产业市场的自由进出(如 Aghion 等，2005；Acemoglu、Aghion 和 Zilibotti，2006)。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轨经济国家来说，由于众多历史与现实约束，很多领域存在着或明或暗的进出壁垒，从长远来看，这将阻碍技术进步的竞争效应发挥。因此，谋求危机后的熊彼特复苏，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进一步放开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3.2 制度基础与制度创新

技术演进不仅依赖于竞争政策，同样它还依赖于一定的制度基础。按照制度的功能与作用范围，可将制度简单分为构建性制度和互补性制度，前者包括诸如产权制度等在内的根本制度形态，它与时间、空间等基本社会构建要素一样将全方位影响经济生活(Granovetter，1992)；后者则是更为微观的制度形态，它的存在将影响组织层面的微观行为，比如技术进步(Scott，2008)。科技史的比较研究表明，技术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需要适切的制度基础支撑，这种制度形态基础主要指的是构建性制度；而引发技术变迁的主要是互补性制度。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政策操作必须同时处理好上述两类制度的变迁效应。

产权制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构建性制度，技术演进的制度基础必须基于私人产权制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注意到(如金培、刘戒骄，2009)，在经济“衰退-复苏”过程中，国有化似乎是各国都会采取的一种重要政策，这与私有产权是对立的。笔者认为，这种国有化策略是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因为在危机发生之时，国有部门往往具有某种特殊的优势以抵御冲击带来的风险。然而，这种“暂时的”和“局部的”国有化并不意味着对私有产权制度的总体否定，相反，它是对产权效率的整体动态权衡。将产权制度的效率分为激励效率与风险抵御效率，那么在衰退时期，政策目标是尽量减少冲击带来的负效应，此时，提高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成为政策操作的优化选择；而在经济走向复苏之时，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降低，给予企业足够的经济激励将成为政策的最优选择。对于实行渐近转轨的国家来说，由于经济中本身存在大量的国有部门(国家资本主义)，在风险抵御上存在一定优势；但是，在经济走上复苏之后，为了保持持续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则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和制度转轨，以发挥构建性制度的根本激励作用。

除了构建性制度，复苏过程中政策层面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技术互补性制度，或者说与技术进步匹配的制度创新。在技术水平固定的前提下，某种制度变迁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是先递增，在达到最大边际贡献之后逐步减少（黄少安，2000）。因此，如果能够使得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在高位处跃升，则将获得更大的制度变迁收益，并能避免制度因素成为技术变迁的桎梏约束。在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变迁前期的递增边际收益导致了制度形态的锁定效应，并造就一批即得利益集团；在边际收益递减阶段，即得利益集团与整个经济系统对制度形态与变迁决策将存在冲突，在没有强制性因素介入的情况下，制度变迁的收益仍然会沿着递减曲线，这意味着内生的制度变迁无法实现制度边际收益的顶点跃升。因此，要实现边际收益的高位跃升，必须依靠外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手段。在经济复苏过程中，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导者应该是政府，根据陈元（2009），西方国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采取了大量的政策迫使互补性制度的强制变迁。当然，上述分析的前提是技术水平固定，现实中，技术变迁与互补性制度的变迁是同时进行的，结合 North 和 Wallis（1994）提出的分析框架，互补性制度的变迁还应该考虑边际收益曲线的整体平移。在收益曲线移动的情况下，边际收益曲线的顶点不再固定，它是技术前沿和制度要素的共同函数，因此，适切的强制性制度政策还需要对动态顶点进行定位。

4 余 论

异质性企业能力打开了“衰退-复苏”的过程黑箱，异质性企业能力的动态分布形塑了不同的经济复苏路径；通过研究异质性企业能力的动态演进，本文得到了企业能力演进（技术演进）的达尔文竞争效应与制度变迁效应，两者成为经济复苏的政策落脚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取增长导向的达尔文竞争效应，即技术演进策略转向与有效竞争政策设计。前者的政策含义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弃追赶型技术演进的角色策略，有步骤的转向中间策略，最终实现创新型角色策略；这是保证经济实现熊彼特复苏的关键所在。后者的政策含义则更加微观，在经济“衰退-复苏”的过程，政策制定应该有意识的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并在复苏进程中进一步放开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竞争效应。对于制度变迁效应，本文同样提出了两个具有重要政策意义的观点，即有效的构建性制度安排与动态的互补性制度创新。其中，构建性制度安排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需要根据经济运行态势从全局视角权衡构建性制度的激励效应与风险抵御能力，这典型的表现形式为“衰退-复苏”的不同阶段采取的国有化与去国有化政策；互补性制度创新的政策含义则是要求政府提供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供给，以使得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在顶点处实现跃升。

根据这些研究结论，下面简要分析一下中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采取的系列措施。首先，我国政府推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产业振兴计划，在这些振兴产业中，并不单单是很多学者一直力荐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反，很多传统产业进入了振兴计划范畴。结合本文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的产业选择是有效率的，因为我们谋求的是整个经济布局的整体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技术前沿发展水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产业的企业能力就不如高新技术企业。从企业能力的整体推进来看，本次产业振兴计划中的产业布局设计具有全局性，比如将物流产业纳入振兴计划，其理论依据正是想借助制度变迁推动技术变迁，因为物流的核心功能对应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从各个产业的振兴规划细节可以看出，政策制定的着眼点没有脱离“企业能力”，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自主创新等政策条款在大部分产业振兴规划中都被反复提及。

在制度层面，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举措，那就是在关键领域实施的“国有化”。比如，山西的煤炭业重组，虽然可在当前收到良好的风险抵御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国有化不能也不应该全局推广。笔者的观点是，在关键领域，国有资本不可轻易退出，但是也应该允许部分私有资本的存在，即实现我们一直坚持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格局。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综合考虑了风险抵御能力与制度激励效率。在不涉及系统性风险的领域，则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强制推行国有化政策。当然，关键领域的国有化政策还存在很大的外部性，它在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资本的畏惧与政府声誉的损害，因此，即使是关键领域的国有化政策也需谨慎出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规划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目前的政策定位仍然是“刺激”经济；为了谋求强势复苏，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该提早做好复苏阶段的政策规划，而这些政策规划的要点应该放在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变迁，具体的政策措施应该围绕企业能力演进的两大推动效应。而从全局来看，正如金培和刘戒骄（2009）所指出的，最终的政策导向仍然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战略。

① 洪银兴教授为中国经济复苏提出的政策建议可参考署名文章《打造高科技 迎接新增长》（载于《人民日报》，2009

年5月25日08版),《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后危机阶段的思考》(载于《新华日报》,2009年8月25日B7版)。

② 对于这四大路径的命名,熊彼特之名源于熊彼特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的创造性毁灭机制;弗里德曼路径的命名则源于弗里德曼(Friedman, 1993),他在该文中最早阐述了该路径的形态特征;汉密尔顿路径的命名源于汉密尔顿(Hamilton, 1989),他在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与经济周期关系时提出了改路径。

③ 代表性个体的研究范式与企业理论的古典研究范式类似,在企业理论研究中,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是打开企业黑箱的钥匙,此处,异质性企业能力是打开“增长黑箱”的钥匙。当然,如果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挖掘,交易成本异质可以作为企业能力异质的一个来源。

④ 不管是企业理论还是管理理论,资源基础学说(resources-based view, RBV)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处,本文借用企业资源基础学说的基本观点来说明企业能力是异质的,详细讨论参考Barney(1991)。

参考文献

- [1] 阿吉翁·菲利普、霍依特·彼得:《内生增长理论》,陶然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 [2] 陈元:《后经济危机阶段:加速发展路径的强制性变迁》,《管理世界》,2009年第9期。
- [3] 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 [4] 金培、刘戒骄:《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国有化措施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
- [5] 靳玉英、吴茂松:《拉美和东亚国家(地区)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恢复比较》,《国际金融研究》,2006年第9期。
- [6] 刘树成、张晓晶、张平:《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 [7] 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何畏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 [8] 杨春学、谢志刚:《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
- [9] 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张定胜,张永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3年12月。
- [10] Acemoglu Daron, Aghion Philippe, Fabrizio Zilibotti, 2006,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4, No.1, pp.37-74.
- [11] Aghion, Philippe, et al, 2005,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0, No.2, pp.701-728
- [12] 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2006, “Appropriate Growth Policy: A Unify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4, No.2-3, pp.269-314.
- [13] Barlevy Gadi, 2002, “The Sullyng Effect of Recess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9, No. 1, pp. 65-96.
- [14] Barney Jay,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17, No. 1, pp.99-120.
- [15] Bartelsman J. Eric and Mark Doms, 2000, “Understanding Productivity: Lessons from Longitudinal Micro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8, No. 3, pp. 569-594.
- [16] Ben-David Dan and Papell H. David, 1995, “The Great Wars, the Great Crash, and Steady State Growth: Some New Evidences about an Old Stylized Fac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36, No. 3, pp. 453-475.
- [17] Boone Jan, 2001,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and the Incentive to Innov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19, No.5, pp. 705-726.
- [18] Caballero J. Ricardo and Mohamad L. Hammour, 1994, “The Cleansing Effect of Recession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5, pp. 1350-1368.
- [19] Caballero J. Ricardo and Mohamad L. Hammour, 2005, “The Cost of Recessions Revisited: A Reverse-Liquidationist View”,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2, No. 2, pp. 313-341.
- [20] Cerra Valerie and Chaman S. Saxena, 2008, “Growth Dynamics: The Myth of Economic Recove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1, pp. 439-457.
- [21] Crafts Nicholas, 1999, “East Asian Growth before and after the Crisis”, *IMF Staff Papers*, Vol. 46, No. 2, pp. 139-166.
- [22] Friedman, Milton, 1993, “The ‘Plucking Model’ of Business Fluctuations Revisited,” *Economic Inquiry*, Vol. 31, No.2, pp. 171-77.
- [23] Gourio François, 2008, “Disasters and Recove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2, pp. 68-73.
- [24] Granovetter Mark, 1992,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 Vol. 35, No. 1, pp. 3-11.
- [25] Hamilton D. James, 1989, “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stationary Times Ser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Econometrica*, Vol. 57, No.2, pp. 357-84.
- [26] Hunt D. Shelby, 2007, “Economic Growth: Should Policy Focus on Investment or Dynamic Competition?”,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Vol. 19, No. 4, pp. 274-291.
- [27] Nelson R.R. Sampat B.N., 2001, “Making Sense of Institutions as a Factor Shap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44, No.1, pp. 31-54.
- [28] Ouyang Min, 2009, “The Scarring Effect of Recession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6, No. 2, pp.184-199.
- [29] Scott W. Richard, 2008,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 3rd edition, CA: Sage Publications.